

“容闳留美”与洋务召唤

一、林则徐的“师夷”思想与容闳的留学先机

1840年6月，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较量，终于在英国人焦急的等待中到来了。

决定与大清朝开战的计划是在1839年10月由英国内阁通过决议作出的。内阁决定由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懿律率领40余艘军舰和4000名官兵组成的舰队气势汹汹地驶入中国的洋面，由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这一战，大清朝的门户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天朝上国”苦心经营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被击得粉碎。

远隔重洋的大英帝国为什么要不远万里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这要从当时的环境和趋势说开。鸦片战争之前的西方世界，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但是，作为当时头号资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水师在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与英军激战。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

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英国，在工业的发展中，也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困扰。法、美、俄等国也紧随其后存在这种问题。1825年并为之爆发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因为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爆发，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帝国的执政者坐不住了。他们急于向海外开辟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当时被西方视为老大的英国首先把目光瞄向了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中国。

英国人在乾隆朝时就已觊觎中国市场，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觐见乾隆皇帝时，就提出过这一主张。马戛尔尼的这次访华实际上是来中国探路，了解中国情况，为英国在中国开辟商务、外交打前站的。当年的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了马戛尔尼。接见中，马戛尔尼提出，希望中英两国贸易通商，但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断然拒绝。

乾隆皇帝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大清朝作为天朝上国物产丰富，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不需要与外夷互通有无，并警告说，英国人没有经过大清国的允

许，不要再到天津、浙江等地从事贸易、经商了，否则将被“驱逐出境”。

事实上，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的请求，还有一个让他愤愤不平的原因。在接见之时，发生了一桩让史家评议纷纭的礼仪之争。拜见之时，乾隆皇帝和清廷的朝臣们要求马戛尔尼使团按照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礼仪，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则不肯屈尊，坚持认为应该以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下跪，行吻手礼。双方的坚持中，乾隆皇帝退让了一步，让马戛尔尼以觐见英王的礼仪方式单膝下跪行吻手礼。当马戛尔尼轻吻乾隆皇帝的手时，这样的礼仪，乾隆皇帝嘴上不说什么，但是内心却十分反感，心中也在暗骂：你荒蛮外夷，不知中华礼仪，不知上下尊卑，还谈什么商贸往来。因而，马戛尔尼的请求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

马戛尔尼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大为不快地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英国伦敦。在中国的碰壁，也使他对大清朝存有偏见。因而，对于清朝的立国，予以全盘否定。他在其《纪事》中写道，清朝自立国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进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为什么退步了呢？马戛尔尼说，这是因为清朝的保守固步自封，当欧洲人开始使用来复枪打仗时，清朝人却还在为自己军队马上骑射的潇洒而飘飘然。他还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1]。

马戛尔尼访华的一段历史，他的碰壁，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烟消云散，人们已淡忘。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停止，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国内原料紧缺，这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头脑对大清朝的闭关政策很是不满。当时，大清国对外贸易的城市仅限于广州，即便如此，清政府还规定，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必须经过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才能从事贸易。这样的限制下，进入中国的西方商

[1] [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少年行 | 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品应该成为紧俏商品才对。但在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西方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并不受中国百姓欢迎，而中国丝织品、陶瓷等传统手工制品却深受西方人青睐，这种局面对于大清朝是贸易顺差，而对于西方却是贸易逆差。英国人当然不想让这种尴尬的局面持续下去。权衡利弊，英国人利用鸦片对中国的贸易获取暴利，并希望以此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对人们的危害是巨大的。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众，鸦片害民祸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对于中毒甚深，搞得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的鸦片嗜食者，国人斥之为“鸦片鬼”。

鸦片危害，不仅伤害个人，对家庭、社会甚至国家的危机也是深远的。虽说元朝之时，人们已经知道了鸦片的危害，但当时吸鸦片的人并不多，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吸食鸦片者大量出现，乾隆皇帝不得不为此制定了严厉的禁制政策。

乾隆皇帝向全国下达了一条禁令，大意是，凡商人贩卖鸦片，戴枷一个月，廷杖100棍，然后发配边疆；对于官员贩卖鸦片的，加重处罚，除罢免管制外，还要发配边疆为奴，终身不为朝廷所用。乾隆皇帝还为此搞了一场收缴鸦片的“大跃进”式运动，焚烧了千余箱鸦片。严令之下，一时对鸦片商人有所震慑。因而，当时的鸦片流入大多靠的是走私。

到了嘉庆年间，嘉庆皇帝也制定了一些政策。可是禁令难以畅行，雷声大雨点小，致使鸦片走私十分猖獗。崇尚节俭的道光皇帝很想励精图治使国家富强，对于鸦片问题，道光帝很想做到令行禁止。因而，他在乾隆、嘉庆政策的基础上，对吸食者也治以重罪，对鸦片走私坚决打击。但走私犯很狡猾，改过去的岸上交易为海上趸船交易。

为此，1837年6月，道光皇帝下令要求两广总督邓廷桢驱逐这些走私商船，“严饬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回国，无许托故逗留。并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

一个月后，道光帝又谕令邓廷桢严厉打击私贩鸦片商人。根据谕令，邓廷桢通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等撤走趸船，停止鸦片走私，却遭到了英商的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邓廷桢不得不采取铲除“快蟹”走私小艇的办法，使其货源无法提出，从而使贮存在趸船的鸦片无法出售。同时，邓廷桢又对国内的鸦片贩子进行严厉的清查打击。邓廷桢的禁烟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禁止鸦片非一时一日之功。鸦片走私活动仍十分猖獗，白银大量外流并未改变。这也使得道光帝感到要使禁烟政策做到令行禁止，必须痛下重手。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呈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建议采用重治吸食洋烟的方法禁止鸦片。

黄爵滋说，鸦片是害民之物，从国计民生考虑，吸食鸦片有病国之忧。因此，黄爵滋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者”^[1]。

黄爵滋是一个典型的禁烟派，他的建议同道光皇帝的想法如出一辙，因而道光帝阅览他的奏章后，又谕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对黄爵滋的奏章提出更合理的建议。

道光皇帝的谕令下达后，作为湖广督抚的林则徐十分认同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结合自己在湖广辖境的经验，也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章。他在奏章中说，严刑峻法是可以禁绝鸦片的。

林则徐在奏章中还附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说明了吸食鸦片的危害。道光皇帝看了林则徐的奏章，让他入朝觐见。最高领导人要召见谈话，使林则徐意识到了责任重大。入京之前，他感到道光皇帝可能命他主持禁烟。事实果不出所料，从1838年12月27日到1839年1月3日，道光帝先后召见了林则徐八次，给予他极高的礼遇，恩赐他紫禁城骑马、上毡垫，并谕令他全权主持禁烟。于是，由林则徐负责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全面展开。从1839年2月开始，林则徐接连发布政令，严厉打击鸦片贩子和吸食者。

林则徐雷厉风行地禁烟，严重打击了鸦片商人和吸食者的嚣张气焰，并没收了大量的鸦片。仅1839年6月3日到25日，林则徐就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万公斤，史称“虎门销烟”。

[1] 林庆元：《林则徐评传》第5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少年行——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重大胜利，让道光帝很高兴，也很振奋。他认为，这是他励精图治的重要步骤。林则徐虎门销烟给英国资产阶级贸易集团造成极大的冲击，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于是一再发起武装挑衅，并鼓动政府发动战争，说林则徐禁烟是“不可饶恕的暴行”，是对英帝国的一种侵略，对中国“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1]。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以大清国的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而告终。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的。整个战争中，英国人出动不到两万人，竟然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而当时的中国拥有 80 万军队。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技不如人、器不如人。这场战争中，英国人以坚船利炮同中国作战，清军虽然也使用了火炮，但大部分都是长矛加大刀的冷兵器，使用的火炮也是粗笨的老式火炮，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

不对称的作战武器，人员的伤亡情况也大不相同。在大角、沙角之战中，清军战死 277 人，而英军只有人员受伤，没有官兵死亡；在虎门之战中，清军战死 250 余人，而英军却只有 5 人受伤；在吴淞之战中，清军阵亡 88 人，而英军只有 2 人战死。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虽然拼死抵抗，但这些不对称的数字，在失败的阵痛中，却道出了中西方差若天渊。

鸦片战争的胜利，使英国人从此一洗被清帝国拒于国门之外 120 余年的耻辱。而被战争吓破了胆的道光皇帝和他的近臣们则惊慌失措地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国人的成功，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索要多端提供了范例。此后，美国、法国、沙俄等列强也一窝蜂地涌进中国，起哄地提出各自的要求，并派出军舰在中国海域逞威。与英国人开战遭惨败，道光皇帝已是惊弓之鸟，经受不住任何威吓，于是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是美国侵略者从中国勒索到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无割地、赔款外，美国不仅获得英国在《南京条约》中取得的全部侵略特权，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权。

[1] 林庆元：《林则徐评传》第 108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琦善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人谈判

继美国之后，法国也派出军舰到中国海域逞威，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黄埔条约》。

目睹中国的惨败以及西方列强的纷纷强索，在禁烟运动中与西方人接触较多的林则徐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主张。林则徐并非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人，但他却把列强的侵略与中国学习西方抵御外侮紧密地结合起来。林则徐是道光朝官员中了解“夷情”较多的一个。起初，他受道光帝之命，出任湖广总督后，了解到西方人渴望与中国贸易通商的心情非常迫切，特别是英国人大量地向中国私售鸦片，使他感到，了解西方情况，做到知己知彼非常重要。因而，他经常从英国商人那里买来英国报纸，并组织人员翻译西书。

老实说，林则徐最初对西方的认识和大多数人一样，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马戛尔尼不肯向乾隆皇帝行跪拜之礼一事，他也认为是西方人不知礼数，随着对西方的了解增多，使他感受到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为此，林则徐特意聘请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作为他的智囊，帮助他了解西方情况。

1840年，林则徐组织编译成的《四洲志》系统地介绍了英法美等世界上

少年行——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一些主要国家的地理和社会风俗、政情，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提供了借鉴。

林则徐特别对欧美强国做了丰富的记载，他在《四洲志》说：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须人力。”对于法国，林则徐这样说：“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1]

《四洲志》丰富而系统地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描述，充分显示了他渴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心情。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在他对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说：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造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后来，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英国人迁怒，道光皇帝慑于英国人的淫威，便把责任推到了林则徐身上。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使道光帝对禁烟和抵御外侮政策产生了动摇，认为只要惩办了林则徐就可以和英国人握手言欢。于是，林则徐被革职、查处，后被流放新疆伊犁。在前往伊犁途中，他总结泱泱大国的中国败于英国的原因，深深地感到“器不良”“技不熟”是主要原因，他说，大清要不受外夷欺侮：“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才是根本。作为朝廷的罪犯，他仍然无所避讳，他对道光帝的软弱一针见血地说，与西方人作战，不谋求造船造炮，编练水军，只能自取失败。

林则徐忧心忡忡希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但当时的道光帝不接受，朝廷中的保守派更对他招募华侨和教会学堂学生为幕僚视为“汉奸”的举动。虽然如此，出身于福建一个贫困塾师家庭的林则徐，从小在家风的影响下就形成了在任何条件下都不畏困难的顽强品格。面对朝廷中保守派的指责，林则徐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林则徐在去往新疆伊犁途中，路过镇江时，他的好友魏源特意赶来相送。

[1] 夏东元：《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

那时正是初秋时节，天气清爽。魏源经过与护送的差役通融，他们才得以同住一室，两人把酒畅谈，共叙友情，谈到国事时，林则徐将自己组织人员编译的《四洲志》等有关西方国家情况资料交给魏源，希望魏源继续对世界各国的情况进行研究。

魏源不负重托，他根据林则徐鸦片战争的斗争实践、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以《四洲志》为蓝本编著《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说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如何师夷制夷呢？魏源给出了三个答案，一是坚船，二是利炮，三是养兵练兵之法。这为后来的洋务派强军提供了参考。但在道光朝，魏源的主张仍然得不到支持和响应。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风气未开。按理说，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挨了打的清王朝本应该研究自己为什么会被西方打败。正所谓兵家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西方国家的情形进行研究，做出相应的对策。既然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发现西方列强的“技”和“器”优于大清，就应该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可是当时的大清，朝野上下大多数人仍然抱着固有的思想，认为大清乃“天朝上国”，什么都优于西方，一次失败不足为虑。从道光皇帝到他身边的那些保守顽固的近臣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化才是正统，只有中国改变西方，没有西方改变中国的道理。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朝完全是无所作为的。

道光帝和朝廷中的保守派虽然反对中国学习西方，但毕竟洋枪洋炮已经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南京条约》也使得大清朝被迫允许西方人到中国自由贸易，英商可以到中国自由居住。此后，在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传教、设立医院等等。既然有这个背景，朝廷虽然抵触，但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入，因而，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先进技术是在被动的局面中进行。在当时，中国人视西方为“蛮夷”，大多数人谈到西方都谈虎色变，不可能主动通过游历、留学、商贸等方式“睁眼看世界”。

晚清中国，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是以传教士为主要途径的。西方文化的传入非自鸦片战争始，以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为前导，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展开，

少年行——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允许西方国家到中国传教、商贸，使得大批的传教士涌入中国。传教士到中国后，他们在中国设立教会，开设教会医院、教会学堂等等，积极对中国产生影响。

当时，以传教的方式对中国积极进行西式教育的“马礼逊学堂”当属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马礼逊学堂”是英国人来华创办的一所较早的西式教育学堂。校名中的“马礼逊”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名字，1834年，马礼逊在中国病逝。他病逝的第二年，在华传教士为纪念他在传教事业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便在澳门以“马礼逊”的名义创办了一所小学。这就是后来的“马礼逊学堂”。1843年，马礼逊学堂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校址在今天的摩理臣山。塞缪尔·布朗博士成了该校的第一任校长。

“马礼逊学堂”作为一所西式学堂，当时英国教会的初衷是为教会服务，但是，它却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推动了中国人“自强”意识的觉醒，这是西方人所始料未及的。

被后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和他的两个小同窗黄宽、黄胜在马礼逊学堂几年的学习生活，在布朗博士的带领下走出国门，接受西式教育，最初，学堂也是希望他们将来为西方传教事业服务的，但是，他们到国外后，西方的发达、文明却激发了他们渴望通过所学使祖国强大的梦想。三人中，容闳是最具典型的代表。

“马礼逊学堂”最初在澳门创办时，容闳的父亲便把他送到学校读书，那年容闳7岁。学堂迁到香港时，容闳也随学堂到香港读书。在马礼逊学堂接受教育的几年里，使得容闳对西方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了解，因而对西方世界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容闳和他的两个小同窗在1847年1月启航前往美国。当时，容闳还不知道到国外留学的意义，他只是在马礼逊学堂学习时，听布朗博士讲述美国的情况，因而对美国产生了向往。当时，容闳还不知道自己到国外学习的目的，但是他曾经梦想过走进一片神奇的新大陆。

容闳曾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谈到他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曾经



容闳

作过一篇《梦想之纽约游》的文章，文中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

人生梦想往往成为人们某一个理想的动力，想不到马礼逊学堂校长塞缪尔·布朗博士的一个宣布，竟使容闳走进新大陆的梦想成为现实。

布朗博士决定带几名学生到美国学习，是在1846年12月的一天。那一天，天气很好，容闳和他的同窗们像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坐着，等待他们的老师布朗先生来给他们授课。临近中午的时候，既是老师又是校长的塞缪尔·布朗博士面带倦容地走了进来。

他声音有些沙哑地对学生们宣布：“同学们，我因健康状况欠佳，准备休假回国调养。此行愿带三五名学生赴美留学。我已与香港基督教教会的几名教友谈妥。他们愿意为每个同学提供2年的留学经费和父母的赡养费。诸生有愿意前往者，请起立。”^[1]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当时许多同学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这样的

[1]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少年行 | 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机会如果放在今天，肯定会有无数的学子争先恐后地报名，但在晚清那个闭关锁国的时代，到国外留学，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里还没有那个认识。40多名中国学生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最后仅有三个人悄然站立。这三个人就是容闳、黄胜、黄宽，由此，他们成为了晚清中国的留学先驱。

要跟随塞缪尔·布朗博士出洋留学，这个大胆的决定，对于容闳的父母来说，无异于石破天惊。

当容闳把布朗博士要带他们到美国的消息告诉父母的时候，以农为生的父母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惊惧、无所适从。当时在人们的传言中，海外是一个蛮夷遍地的世界，那里的人都长着一身红毛，大清国的子民因此称那里的人为“红毛人”。容闳的家乡是广东香山县的澳门小岛。此时，澳门岛已经被葡萄牙殖民者租占近三百年。租占的历史里，也许是百姓对外来者的天然抵触情绪，因而，将这些外国的“红毛人”视为妖魔的化身。百姓们还传言：“红毛人”见到中国的小孩后，会将他们开膛剖肚，挖眼掏心。港澳居民中虽有人跨海出洋过，但那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远走异域他乡谋生，至于出国留学，更是前所未闻。何况容家在当时是小门小户的农民家庭。因此，对于儿子要去美国留学，父亲反对，母亲还为此潸然泪涕。起初，容闳的父母送他们到洋教堂学习，目的不过是希望儿子在教会学堂里学点文化，学点洋文，将来好在香港的外国人家里当仆人，找点事做，根本没有想到将来要出国留学。

儿行千里母担忧，容闳对父母的担忧是理解的，他劝说母亲之后，于1847年1月4日，随布朗夫妇以及黄宽、黄胜两个小同乡一起踏上了留学美国的行程。他们所乘坐的是美国奥利芬洋行的“亨特利思”号商船，船由黄埔港出发，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绕道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商船在途经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时做了短暂停留，圣赫勒拿岛是拿破仑的终老之地，容闳和几个小同乡及布朗夫妇一起走下商船上岸拜谒了拿破仑陵墓。容闳是一个感性的人，离开小岛时，他特意折取坟前柳树上的一枝柳条带回船中，准备赴美登岸时栽植留念。数年之后，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带到美国栽种的细柳，已是枝叶丰茂的大树。

1847年4月12日，经过长达98天的漫长旅行，“亨特利思”号商船终于抵达美国纽约港。容闳、黄宽、黄胜三个孩子随布朗夫妇一起抵达美国后，布朗先生将他们送进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孟松学校是当时美



容闳就读的孟松学校

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在这里，容闳、黄宽、黄胜三个中国孩子有幸被孟松学校校长海门亲自教授。海门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尤其在英国文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海门不同于中国私塾先生的填鸭式教育，他反对把学生训练成“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有灵性的鹦鹉”，他注重的是培养学生“优美的品格”。

名师的引导，容闳很自然地融入到新的学习环境之中，并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方式。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贫苦的学生，稍稍为人工作，就不难得到学费，每星期只要得到1元2角5分美金，就足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费用；而劈柴、生火、烧炭等，须学生自己料理。

这对于容闳来说，倒没有什么。他认为，这正好是磨练筋骨、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容闳的住处与学校有半英里的路程，他把这半英里路程也充分利用起来，作为运动的一个途径。他每天从学校到住处往返三次，都是徒步，有时跑步到校，寒来暑往都是如此，长年的坚持运动，不仅使得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饭量大增，身体也比在国内时更加强壮。

1848年秋天，同去的黄胜因病回国。另一位同学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后，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容闳因为有一个理想，想进入耶鲁大学，因而便没有和黄宽同往。

黄宽之所以选择到爱丁堡大学读书，是因为到那里读书可以得到资助，这也是资助他们的香港教会的计划，但容闳更神往海门校长和布朗博士的母校

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耶鲁。但是，到耶鲁大学读书，香港教会并不予资助，这使得容闳进入耶鲁大学读书的愿望成为难题。没有经济来源，求学和生活都将无法得到保证，况且，没有经费他也无法进入耶鲁大学。

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容闳自然无法再继续求学。他一人置身异域，无所依靠，只好向布朗先生求助。布朗先生找到孟松学校的校董。校董同意资助容闳进入大学读书，但他附带了一个条件，要求容闳毕业后必须回国充当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按说，容闳从小就接受美式教育，对美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况且现在在美国又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学习，对美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有了更深的认识。但当孟松学校校董对他说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没有思考就断然拒绝了。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他认为：“人类应尽的天职，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1]

容闳不愿改变自己的宗旨，他的宗旨是什么呢？他曾经对他的恩人布朗先生说：“我虽贫穷，但生性自由，毕业后无论选择何种职业，只求选择对中国最有益的工作。”

容闳的这番表态，也使得布朗博士感到，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不会因为贫穷和眼前的利益而改变初衷。因而，他对他这个昔日的小学生越发喜欢，甚至产生几分敬佩之情。人生际会，命运往往难以预料。当容闳不愿做传教士而得不到资助时，内心不免也产生几丝恐慌，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没有进入耶鲁大学的学习经费，每日里还要为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发愁，衣食无着的境遇下容闳本打算打点行装回到国内。1850年夏天，容闳希望进入耶鲁大学的愿望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机。斯时，布朗博士到南方探望亲属，顺道造访了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他带回了好消息：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

[1]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8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得到萨凡那妇女会的支持，容闳很快考入了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容闳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除此之外，他也通过劳动获得一些收入，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学校考虑到他的困难，让他当学校兄弟会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也可以获得一些微薄收入。他平时非常省吃俭用，甚至节省下30美金，托人辗转带回国给自己的母亲。

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在美国的教育史上，这是一所富有传奇经历的综合性大学。1701年，以詹姆士·皮尔庞为首的一批公理会传教士说服康州法院开办一所学校，使青年“可以学习艺术和科学……为教会和国家服务”，康州法院同意了这个请求，随后，10位传教士从他们藏书不多的图书馆里拿出40本书，作为对建校的支持。1701年10月，教会学校正式成立，传教士们推举哈佛大学毕业生亚伯拉罕·皮尔逊为第一任校长。171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高层官员伊莱休·耶鲁先生向这所教会学校捐赠了9捆总价值562英镑12先令的货物、417本书以及英王乔治一世的肖像和纹章，这些现在看起来极其普通的物品，在当时对襁褓之中的耶鲁简直是雪中送炭。为了感谢耶鲁先生的捐赠，学校正式更名为“耶鲁学院”。后来耶鲁学院发展为美国颇具规模的第三所大学。

容闳到这里读书时，耶鲁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规模。耶鲁的功课对刚入学的容闳来说非常难。头一年，他每天读书到深夜，身体吃不消，一天天变得消瘦。这样，他不得已休学一周，到布朗母亲的家中休息。第二年，最苦恼的是微积分，考试常不及格。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在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

容闳的一位好友回忆：“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学业中，容闳遇到不少的困难，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读出了好成绩。“容闳终于闯过来了。”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从纽约乘船踏上回归祖国的路程。此时，容闳已在美国求学8年，他信

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心满满，决心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8年的祖国。他能改变祖国的命运吗？

容闳坚信，通过国外所学，改变中国将成为时代潮流和趋势。他出国留学那一年刚刚18岁，这是一个人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年龄段容闳在塞缪尔·布朗博士的带领下，来到美国这块新奇的土地读书。他从启蒙到中学、大学，受的是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的文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新兴的自然科学他都认真学习过。容闳留学时的美国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时代，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美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科学技术也飞速发展，相继发明了铁路、电话、汽车等新技术。这些开创性的创造也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在教育方面，美国政府重视科研和教育的作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奖励科学发明。美国的这些开创举措使留学美国的容闳已深有感触，这也是他认识到在美国学习，不应该只是学习语言，猎取异闻。那样，充其量只能是鹦鹉学舌，不能灵活运用工具而已。容闳明白，在美国所学，就要学习精髓，所学为中国所用。留美期间，他广泛接触美国社会，接触能够改良中国社会的新思想、新文化，他的这种前瞻的思想，他的一位美国朋友布斯后来评价说，容闳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有强烈的爱国心”。

容闳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所观所感，使他感到中国人应该抛开固步自封的思想，“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美国。容闳认为美国的崛起，很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他考入耶鲁大学之时，他想着努力学好自己的学业，将来报效自己的国家。他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说：“如果住到1854年夏，我将获得文学士学位。此后我将考虑回国，并且仔细考虑将来的职业。谈到职业，我还没有一定的结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将来要学习农业化学，我也许去学习内科和外科医学。有那么多东西，而且每一种都对想为祖国谋福利的人同

样具有价值，以致要想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是实在太困难了。”^[1]

容闳由美归国之举，表明了他希望回报祖国，使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的理想追求。他的好友特韦契耳写道：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一个美国公民。

虽然在思想观念上容闳已经“西化”，而且也有机会留在美国，但他依然选择了回归。尽然，他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环境。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以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不仅如此，考虑到他曾经所呆乏地、他的变化和他将来的打算，他在社会上不可能不遇到歧视、怀疑和敌意。容闳也知道，回到国内，不一定会有好的前景。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在他的耳边萦绕回响。经文上说：“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了教义，因而比异教徒更坏。”

容闳希望凭美国所学，促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学习美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美国的自由开放，使他感受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清廷的闭关锁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他把大清国和美国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封建专制的腐朽、反动，不变革，中国亡在旦夕。他在大学毕业前夕曾这样写道：

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知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2]

[1]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1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少年行——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美国。容闳最大的感触是，美国教育事业非常发达。中国教育体制的落后，这也正是中国贫穷、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容闳很希望中国的青少年像他一样接受美国教育。

他在自传中说：中国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我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

容闳的想法，正是当时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对于容闳来说，中国是他思想的异乡和血缘的故土，出于对故土的热爱，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拯救祖国于水火中，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中国。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先驱，他做好了“去异乡流浪”和挑战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而实际上，回归之路的坎坷，实现理想的艰难，还远在他的预料之外。

二、曾国藩推动洋务运动昭示留学强国

留学美国的容闳归国后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 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便爆发了，这次战争的浩劫，使得继道光之位的咸丰帝不得不与西方列强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等一系列更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但这些条约，列强们并不满足于《天津条约》的既得利益，仍然时刻蓄谋重新挑起战争。

1860 年，英法联军再次攻占天津，并进犯北京，坐在皇宫的咸丰皇帝害怕了，打着北狩的旗号，仓皇北窜，将其祖宗的家产连同其子民们丢给了列强。

咸丰皇帝跑了，英法联军的铁蹄野蛮地踏进了北京城。一夜之间，千年古都成为人间地狱，百姓惨遭屠戮，妇女遭到奸淫，雍正皇帝亲手建造的花园——圆明园，也被联军野蛮地烧为灰烬。这个悲剧的场景是在 1860 年 10 月